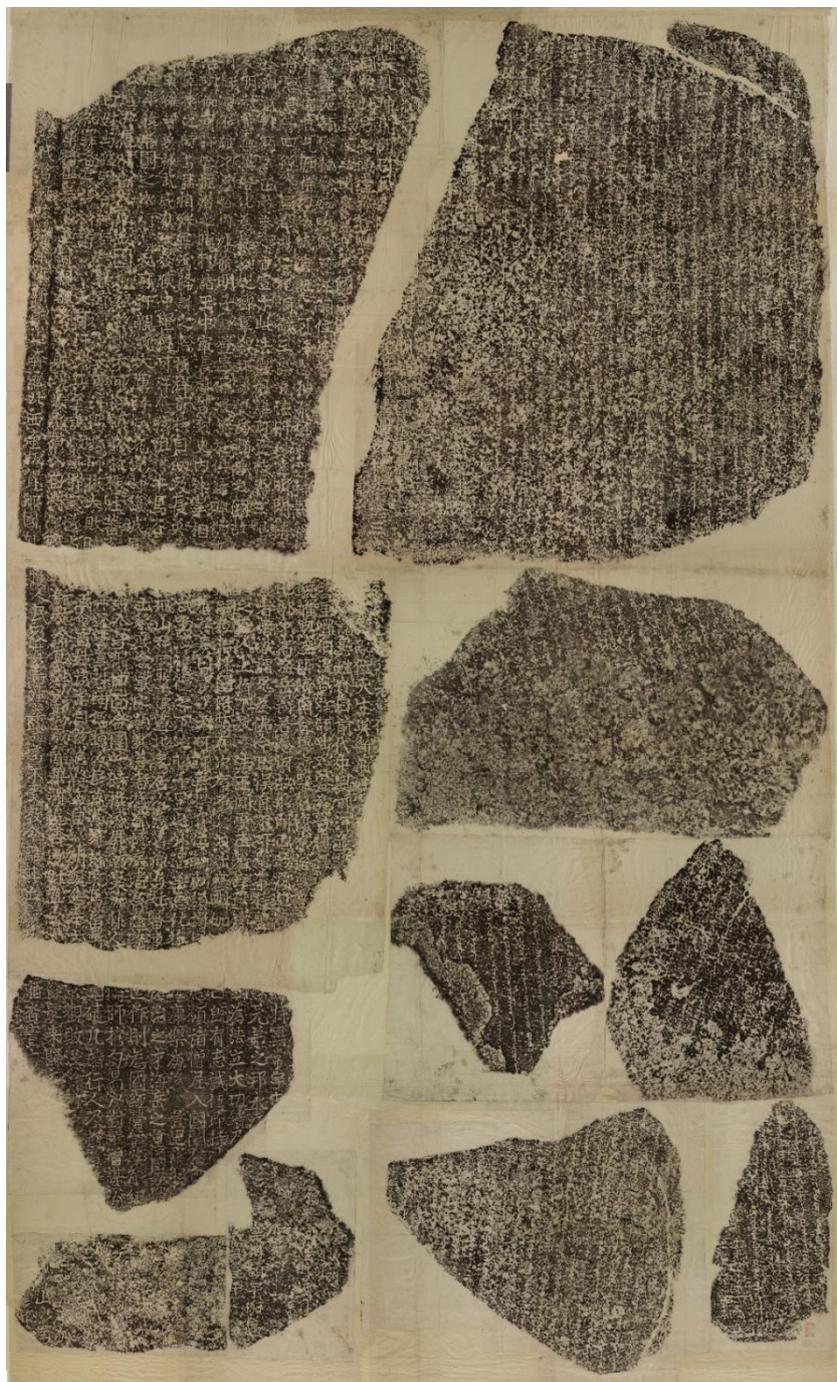


九姓回鹘可汗碑



九姓回鹘可汗碑 唐元和九年（814）清末拓本

九姓回鹘可汗碑全称“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”，系用汉文、粟特文、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的三体石碑。此碑位于蒙古共和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畔哈刺巴刺沙衮地区，即回鹘故城鄂尔都八里、蒙古故城哈刺和林附近。

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（814），发现时已碎成 20 余块，文字损毁严重。碑高约 350—

360 厘米，宽 176 厘米，厚 70 厘米，转角处宽约 5.5 厘米。汉文直书，刻于石碑正面左侧，正面 19 行，左转角 1 行，碑左侧面估计还有 14，共约 34 行，每行约 78 或 80 字；粟特文直书，刻在碑正面右侧，正面 27 行，右转角 1 行，碑右侧面估计尚有 17 行，共约 45 行；突厥文横书，刻在碑阴，大约 116 行，每行约 70 或 75 字。

1889 年，俄国探险队雅德林采夫（N. M. Yadrintsev）发现此碑，并盗走两块。1890 年，芬兰考察队海开勒（H. Heikel）光顾此碑，并拍摄了碑文。1891 年，俄国再次派出拉德洛夫（W. W. Radloff）率领鄂尔浑考察队制作出新的拓本。翌年，俄国驻华公使把这一新拓本送交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请求考释和林三碑（阙特勤碑、毗伽可汗碑、九姓回鹘可汗碑）。洪钧将此交予在此任职的沈曾植，沈曾植撰写跋文，此即“总理衙门书”，是此碑的早期研究。随后荷兰学者施古德（G. Schlegel）、德国学者缪勒（F. W. K. Müller）、汉森、法国学者沙畹、伯希和、日本学者安部健夫、羽田亨等分别进行了解读。中国方面继沈曾植之后又有李文田、罗振玉、王国维等人的进一步研究。近些年来，美国学者哈密顿，尤其是日本学者森安孝夫、吉田丰对石碑碎片及其各国拓本做了全面的整理复原和系统研究。

石碑的不同拓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，可参考林梅村、陈凌、王海诚的《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》。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都存有石碑的拓片。

据碑铭汉文的铭刻，立碑者为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思，汉文的撰写人为伊难主和莫贺达干。据学者们的研究，此碑记述回鹘汗室先世葛勒可汗（747-759 在位）、牟羽可汗（759-780 在位）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；牟羽可汗从中原引入摩尼教，回鹘人改变了旧的萨满教信仰，摩尼教远播漠北，西达天山；回鹘保义可汗（808-821 在位）出兵西域，与吐蕃展开斗争，协助唐王朝保卫北庭（今新疆吉木萨尔）、龟兹（今新疆库车）。此碑是唐与回鹘友好关系的见证。